



汉语词义衍生研究回顾与展望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WORD MEANING DERIVATION

师蕾¹

SHI LEI

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泰国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mrakiet University, Thailand

E-mail: 56364548@qq.com

李仕春²

LI SHICHUN

西南大学，中国

Southwest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546224432@qq.com

Received: 04 April 2023 / Revised: 24 May 2023 / Accepted: 31 May 2023

摘要

关于多义词词义衍生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历经数千年。随着语言学理论不断发展，汉语词义衍生研究也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然而，传统词义引申理论并不能全面解释汉语词义衍生现象。将框架语义学理论、生成词库理论等先进理论和语料库技术相结合，将个案研究和系统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范式对于归纳现代汉语多义词词义衍生规律，进而建立词义衍生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

关键词：语言学；词义衍生；回顾；展望

ABSTRACT

The study of polysemy word meaning derivation has been practiced worldwid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theory, the study of Chinese word meaning derivation has also gone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present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word meaning derivation cannot fully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word meaning derivation in Chinese. The academic paradigm of combining advanced theories such as framework semantic theory and generative thesaurus theory with corpus technology, and combining case studies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has a very important enlightening effect on summarizing the law of word meaning derivation of polysemy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and then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word meaning derivation.

Keywords: Philology, Word meaning derivation, Review, Prospect

绪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学界公认，目前我国国家是辞书大国，而不是辞书强国。辞书的灵魂与生命是释义。在辞书释义方面，义项精细度是指多义词义项划分的粗疏与细密程度。2008 年起，李仕春及其团队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从事实和理论两方面说明现代汉语中 100 核心词和现代英语中对应的 100 核心词的平均义项数目基本相当（也即汉英中型语文词典中相对应地 100 核心词平均义项数目基本一致）。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英语中型语文词典中 100 个核心词的平均义项在 10 个以上，汉语中型语文词典中 100 个核心词的平均义项是 5 个左右（李仕春，2016a）。由此可以推测，汉语词典常用词的义项划分比较粗疏，存在漏收、错收部分义项的情况。究其原因，是由于词汇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在语文辞书编纂中，义项的确立与编排，词条的选定与释义，都存在盲目性与随意性的问题（苏宝荣，2000：2）。

语言学对词典学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明显的，辞书工作者应该时刻注意跟踪国内外语言学研究的新动态（张志毅、李智初、张庆云，2015：2）。在词典编纂过程中，词义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心问题。随着语言学理论不断发展，汉语词义衍生研究也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本文对于各时期词义衍生研究的理论、方法和代表性成果进行梳理，以期编纂质量更高、科学性更强的汉语词典，进而推动汉语词汇学与词典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一定贡献。

二、研究范围和内容、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范围和内容

钱宗武、李仕春（2013）指出，考察学术思想史要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变化对与之相应的社会思潮变化的影响，社会变化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因素；第二个层次是社会思潮的变化对与之相应的学术思想变化的影响；第三个层次要考察学者个人的学术思想是怎样在以社会、思潮、学术等因素形成的大背景和他个人小经历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进而再考察他的学术思想怎样造就了他个人的学术成就。根据以上标准，他们把中国语言学学术思想史分为哲学孕育时期、语文学时期和语言学时期共三个时期。李仕春（2017a）指出，从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学研究来看，该分期不仅适用于语义型语言学史的分期，而且也适用于语法型语言学史的分期，具有普通语言学史的意义。



本文采用上述对于语言学学术思想史的时期划分标准，总结在哲学孕育时期、语文学时期和语言学时期三个阶段中，世界范围内语言学学术思想的沿革对语言研究产生的影响，进而探讨汉语词义衍生研究随各个时期的发展而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归纳和梳理在各个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最后展望汉语词义衍生研究理论和方法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三个：一是理清汉语词义衍生研究在整个语言学史发展中的整体关系和内在理路，揭示其发展规律；二是总结各时期词义衍生研究的主要理论和重要成果；三是对新时期词义衍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评价并提出展望。

(三)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文献研究法，仔细分析各时期关于汉语词义衍生的研究文献，从而了解其历史和现状；在了解其全貌的基础上，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对相关研究情况进行分类和梳理。另外也使用描述性研究法，将已有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通过自己的理解叙述和解释出来，努力揭示出各时期汉语词义衍生研究的学术方法、时代特点和发展规律，最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 研究现状

目前学界对于汉语词义衍生研究的梳理和总结较少。吴福祥（2015）从历史语义学角度对两汉以来与汉语语义演变相关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对汉语语义演变研究提出了思考和建议，认为未来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应着力于汉语语义演变模式和路径的发掘，机制和动因的解释以及共相和殊相的探讨，充分揭示汉语语义演变的规律性。杨雪、宋闻兵（2018）从常用词概念、研究历史、研究内容及范围和研究方法等角度对汉语常用词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总结，认为汉语常用词演变的研究内容需要进一步完善，语料范围有待扩宽，研究方法上还要与现代语言技术和现代汉语方言相结合。

结论

四、 研究结果

在世界范围内，关于多义词词义衍生的研究历经数千年。世界语言学史可以分为哲学孕育时期、语文学时期和语言学时期（李仕春，2017a）。不同时期的语言学学术思想的沿革情况对语言研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词义衍生研究也随着各个时期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 哲学孕育时期

在世界语言学史上，哲学孕育时期的起止时间是高度一致的，在中国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前 770 年—前 256 年)，在欧洲是指古希腊时期(前 800 年—前 146 年)(李仕春，2017a)。在这个时期内，政治动荡、经济发展成为中西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同时也促成了学术思想的大繁荣。

这一时期，中西方学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思想同词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古希腊和先秦，学者们分别围绕事物和名称，也即音义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此过程中，学者们重点关注的是词的意义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针对词义开展真正的理论性研究。关于事物分类的讨论是伴随音义之争出现的，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墨子提出的“类概念”的观点。

事物分类观念演绎出义类辞书(张志毅、李智初、张庆云，2015：25)。在“类概念”的影响下，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分类词典——《尔雅》。《尔雅》成书于战国末年，以“辩同实而殊号者”(郭璞注，1985：1)为写作目的，把 2074 条词语按义分成 19 类：释诂(多是古代同义词，177 组)、释言(多是常用词，其中同义词 234 组)、释训(多是叠字，137 条，同义词 36 组，另有非叠音的 15 组)、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兽、释畜(张志毅、李智初、张庆云，2015：25)。除释诂、释言、释训三篇为释语词外，其余十六篇又可按词义和次序分为释人物称用品名词、释自然科学名词、释天文地理名词和释动植物名词四大类。这种按照义类排列词汇的写作体例，奠定了此后中国语文学著作重分类的传统，后世语文学著作大都是在分类观念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尔雅》之后，先后出现了《广雅》《通雅》《别雅》《比雅》《叠雅》等一系列依照其体例而编纂的义类辞书。语文学时期诞生的以《说文解字》《方言》《释名》《广韵》为代表的一大批语文学著作也继承了分类的观念。字书《说文解字》根据“分别部居”“据形系联”的原则把 9353 个字分成 540 部首，并按照始一终亥的顺序进行排列；方言词典《方言》收词 675 条，按意义分编为 13 卷，按照同一事物在不同方言区的不同称谓进行释义；词源词典《释名》所释名物典礼共 1502 条，按字义分为 8 卷 27 篇，以声训的方式解释名源；韵书《广韵》收录 26194 字，按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共五卷，每卷之中用韵做单位，每韵之下读音相同的字又列为小韵，共计 206 韵、3874 小韵。

在此期间，战国的《周易·系辞上》中出现了“引而伸之”的说法，指的是由一件事或一种思想推衍到其他有关的意义，并进一步加以发挥。虽然此时的“引而伸之”还与词义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对语文学时期词义引申术语的提出以及后世词义衍生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 语文学时期

世界语言研究进入语文学时期的起始时间是一致的，但时间跨度却不一样，中国自秦(前 221 年)汉至清代(公元 1911 年)，横跨 2000 多年的历史。欧洲自罗马帝国建立(前 27 年)至东罗马帝国灭亡(公元 1453 年)，横跨近 1500 年的历史(李仕春，2017a)。语文学时期，中西方均处在封



建专制的国家统治之下。语言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也随之转移为解释教义、注释文献、考证字词。

从古罗马时期的拉丁语研究，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民族语言研究，这个时期的西方学者把研究语言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词源学、语音学和句法学方面，虽然在此期间积累起了相当丰富的语义材料，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语义研究。关于词义衍生研究，只有在中世纪的修辞学研究中有所涉及，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观点，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

这段时期内，我国的学者们专注于以“字”为单位解读文献语言、考释文献中的字义词义，从秦汉至清代，考释范式先后经历了由字义到字音、再到音形义互证的沿革。在此期间，词义衍生现象逐渐得到学者们的关注，词义衍生研究在历代语文辞书的编撰过程中逐步走向明朗化和系统性。

一词多义现象在我国词义研究史上首次出现于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 540 个部首，将 9353 字分别归入 540 部。540 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 14 大类。说解文字的一般格式是：先解释字的本义，再分析字形结构，然后根据情况补充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引用经书或用“读若”标音等。对部首皆标明“凡某之属皆从某”，对于部首所辖的字，用“从”表示在形体上和意义上的从属关系，以“从某”来呼应。因为《说文解字》解释的只是字本义，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列举了一个义项，如果有必要说明另外的意义，则用“一曰”表示。

训诂学上第一次涉及词义引申问题的是南唐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这部书除了解释《说文解字》本身的训诂外，还有不少地方说明了词义的引申。《说文解字系传》虽未明确使用“引申”这一术语，但在“通释”篇训中却重视从字形所提供的本义出发，有意识地探讨大量字词的引申义，并对引申的方向、层次和结果有所认识，启发后世学者深入探索，最终使引申成为词义研究的重要理论。

《广韵》进一步推动了多义词释义的发展。《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是由陈彭年等人依据《切韵》所修订而成的一部韵书。它虽属韵书，但却在编纂的过程中将审音与释义并重，在训诂方面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与《说文解字》所采用的“就字解字”的释义方式有所不同的是，《广韵》释义时摆脱了字形的局限，不单解释字的本义，还列举了它的引申义。一些在《说文解字》中不能直接解释的古典文献常用词，在《广韵》中却可以找到有关的义项。

清代学者对词义引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明确地使用了“引申”这一术语，非常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词义的引申现象，共列了 780 多条引申义，从词义引申的途径、方式、特点等方面初步总结了汉语词义引申的规律，阐明了词义引申的系统性。王念孙《广雅疏证》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同样运用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的方法探求词的本义和引申义，并在此基础上阐发词义引申的模式和规则。

在总结这一时期的词义引申研究时，陆宗达、王宁（1981）立足于传统训诂学，深入到汉语词义内部，对一个多义词（或者一组同源词）各义项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将汉语词义引申的理据类型归纳为“理性的引申”“形似的引申”“礼俗的引申”三大类，十小类。他们认为，某两个词义之间的联系，一般属于以上类型中的一种，但作为一个词的整个引申系列，并不单纯只包括一种类型，往往是多种情况的错综表现，并指出在编纂词典或整理多义词的各个义项时，更要重视引申规律，注意义项之间的联系，避免词条的整理烦琐、紊乱和失误。



(三) 语言学时期

世界语言学研究进入语言学时期的起始时间是不一致的，在欧洲，学界公认的科学的语言学研究始自 19 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在中国，语言学研究始自清末民初(1898 年)，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李仕春，2017a）。语言学时期，自然科学技术向社会科学提出了许多紧迫的时代课题，同时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工具。语言学研究除服务于母语者外，还被应用于二语习得和人机对话，因此逐渐成为一门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

1.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

19 世纪，西方学者们主要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下研究词义演变，诞生了历史语义学。1880 年，德国语言学家保罗在《语言史原理》中将词义历时演变的方式总结为扩大、缩小、转移和其他（包括夸张、曲言、恶化和好转）。1897 年，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出版《语义学初探》，标志着语义学的正式诞生。从此，语义学拥有了系统、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我国，1898 年《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语言学研究进入语言学时期。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引入，学者们开始使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分析汉语语法，在模仿和结合的基础上推陈出新。1958 年，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将保罗的词义演变理论与汉语的特点相结合，提出汉语词义演变主要分为“扩大、缩小、转移”三种方式，简称“三分说”（王力，2018：539）。这种“三分说”是从外延视角观察词义演变，可以称为保罗说的简单化、定律化（张志毅、张庆云，2012：231）。之后，葛本仪（2001：183-200）将词义演变划分为“词的一个意义演变”和“一个词的意义演变”共两大类、六小类。齐佩瑢（2004：296）对“三分说”进行拓展，把词义引申归纳为“缩小式、扩大式、变坏式、变好式、变强式、变弱式”共六类。张志毅、张庆云（2012：242-260）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词义引申细化为“转移、转类、虚化、缩小、扩大、深化、贬降、扬升、弱化、强化”十类模式。总的来看，这个时期内词义演变的研究方法是将一个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内的不同词义进行历时比较，进而总结出该词的词义演变脉络。

2. 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语言学界兴起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语义学在其影响下诞生。结构主义语义学认为，词和词义都是具有层级性的系统，应当着重从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对立中研究词义结构、词义关系和词义演变。因此，如果说历史主义语义学注重的是考察“一个词”的词义的历时演变，那么，结构主义语义学则更重视“一类词”之间的关系和多义词义项之间的关系研究。

“语义场”，又称“词汇场”“语言场”，由德国语言学家易普生于 1924 年提出。1927 年，维斯格贝尔所著的《语义理论：语言学的迷途吗？》为词汇场理论的建立进一步打下基础。1931 年，



特里尔受易普生“语义场”概念的启发，提出了“语言场”这一术语，认为词语意义的研究应该从与其相关意义的关系着手。20 世纪 30 年代，语义场理论在德国正式建立起来。20 世纪 40 年代，哥本哈根学派创始人、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在继承和发展索绪尔语言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素分析的设想。20 世纪 50 年代，受到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雅可布逊提出的音位学区别性特征理论的启示，美国人类学家朗斯伯里和古德内夫在研究不同语言中亲属词的含义时提出了义素分析法。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语言学家波蒂埃、格雷马斯等学者充分发展了义征分析理论。之后，语言学家们继承并发展了义素分析法，用以研究和解释词义。

在我国，结构主义语义学理论、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法也随后被引入汉语学界。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作为语义场理论分析词汇的方法，义素分析法被应用到汉语词义的分析和描写中。20 世纪 80 年代起，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从对词义孤立的历时描写转向了对汉语词义系统的探索，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汉语语义演变的研究。

蒋绍愚是较早运用义素分析法讨论古汉语词义演变的问题的学者。他从义位、义素数量的增减和组合的变化来讨论词义的发展和引申（蒋绍愚，1981），随后又进一步运用“义素”等概念对词义的发展变化规律作了更加系统深入的探讨（蒋绍愚，1985）。刘叔新（1982）对汉语词汇的义素进行较为细致的分类，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中。贾彦德结合汉语实际，在《语义学导论》中介绍了义素分析法，后来又在《汉语语义学》中比较详细地整理了义素分析法在国外的应用，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将义素分析与传统语言学的词义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提出自己的方法（贾彦德，1999：51-125）。解海江、张志毅（1993）认为从词汇系统内部分析，新词位代替旧词位、部分词位使用频率逐渐增大、有些词位增加新词素等词位的变化引起了语义场的变动。张联荣（2000：245-297）全面运用义素分析法研究古汉语词义，对古汉语各类词义的变化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 and 描写。张志毅、张庆云（2012：128）在分析了前人诸学说基础上，集大成式地提出了义位组合理论，把由组合产生的义项分为“同化、异化、特指化、虚化、强化、显化、广化、狭化、褒化、贬化”10 种，并站在学术思想史的高度提出了“义位（词义）形成的七元论，即七因素：①音，②音象，③普通义位，④学科义位，⑤物象，⑥物性，⑦物”。对于词典编纂来说，词的义位是其发展为词典释义的基础，“七因素说”的提出有效减少了释义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提高了词典释义的简练性和精确性。

蒋绍愚也是较早运用语义场理论进行古汉语词汇研究和词义演变研究的学者。他从“义位的有无和结合关系”“词的聚合关系”“词的组合关系”和“词的亲属关系”等方面探讨了汉语语义和词汇系统，证明了“语义场”理论在汉语语义研究中的运用价值（蒋绍愚，1989）。黎良军（1995）把词义关系分为两大类：同类相关和异类相关，同类相关指的是词义的语义关系，异类相关指的是词义的组合关系。蒋绍愚（1999）提出“两次分类”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了概念场和概念要素分析法的概念，并通过《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蒋绍愚，2006）、《打击义动词的词义分析》（蒋绍愚，2007）等论文在实践上提供了利用概念场研究语义的范例。符淮青（2006：189-198）介绍了语义场在国外研究的情况，结合汉语实际把词汇场、语义场改称



词群，根据词群成员之间的意义关系将词群分为层次关系词群、非层次关系词群、近义词群、同义词群和综合词群。张志毅、张庆云（2012：68-87）从义位结构的角度出发，根据底层义场中义位之间的关系，分析出“同义结构”“反义结构”等 10 种结构关系。

在语义场理论的基础上，张志毅、张庆云（2012：238）提出了同场同模式原则，指出同一语义场的义位，其演变模式是相同的。后来，他们在考察辞书释义系统性问题时又进一步指出，同一语义场的若干个词的释语模式应该相同或主体模式基本相同（张志毅、李智初、张庆云，2015：155）。同场同模式原则不仅是词义衍生研究的成果，更是词典理论研究的创新。在词典编纂过程中，同场同模式原则要求把同义、反义、类义等词语作为一个个子系统来释义，同一语义场词语的释义使用同一模式。这一原则可以合理地解释处于同一语义场的词的义项分布情况，增强了词典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有效简化元语言。

3. 生成语言学时期

20 世纪 50、60 年代，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主张用演绎法研究语言，注重语言生成能力的研究，语义研究逐渐成为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此影响下，西方语言学界先后出现了解释语义学、生成语义学、逻辑数理语义学等以语义命名的语义学派，探索句法规则和语义规则之间的对应关系。20 世纪 60 年代，菲尔墨提出格语法理论，将“格”深入到语义层面，从深层结构和规则特征两个方面研究句子中的词。在此基础上，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菲尔墨将格语法发展为框架语义学，把词义放在框架结构内，通过描写词所涉及的题元角色来描述句法—语义之间的对应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认知语言学兴起，语言学家开始从认知的角度看待语义的本质，把词义衍生的研究角度转向隐喻、换喻、原型、范畴、意象图式等。其中，意象图式理论的观点更是进一步拓展了框架语义学的研究视野。20 世纪末，普士德耀夫斯基创建生成词库理论，目标是通过生成机制获得词汇在不同语境下的词义引申，而这种生成机制则通过词汇的词义结构描写体系和语义组合机制发挥作用（李强，2016）。由此可以看出，语义研究在生成语言学时期逐渐成为西方语言学研究的中心，有力地促进了词义衍生研究。

自 20 世纪下半世纪以来，语言研究的目的除了为本国人服务外，还为二语习得服务、为人机对话服务（李仕春，2017a）。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语言研究目的的改变，20 世纪 80 年代起，语义—语法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在汉语动词研究方面，袁毓林（2002）指出常见的动词论元角色有 17 种，后来又增加了经事、原因、目的、时间、路径这 5 种论元角色，并将场所改为处所，总共为动词设立了 22 种论元角色（袁毓林，2007）。在汉语名词研究方面，他以生成词库理论为名词设定的四个物性角色为基础，对汉语名词的物性结构做了描写，将汉语名词的物性角色扩展为十种：形式、构成、功用、施成、单位、评价、行为、处置、材料、定位（袁毓林，2014）。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服务于现代汉语的语义知识体系分析和计算机语义自动分析。刘开瑛（2011）介绍了汉语框架语义网的构建基础——框架语义学以及英语的框架语义网工程，分析了汉语框架语义网的构建技术，并介绍了基于汉语框架网的语义角色自动标注研究，把框架语义学理论引进到计算



语言学领域。宋作艳（2015）基于生成词库理论，从名词语义对句法语义产生影响的角度对汉语中的事件强迫现象做了系统的研究，并探讨了汉语和英语在事件强迫上的差异及其原因。章宜华（2015）突破传统释义的理论局限，以构式理论方法为切入点阐述了构式释义的必要性和科学性，运用语料库模式分析的方法，从“常态模式和拓展模式”两个层面和“事件参与者角色的提取，构式模式分析和基于构式的多维释义模式的构建”三个方面探讨了基于构式的多维释义方法。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的同时，也向语言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表现在进入计算机时代后，人们可以在占有海量语料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出常用词的义项分布情况，这为确立词义衍生理论提供了客观条件（陈鸿瑶，2012）。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不再是计算机专家的独有领域，它正在对语言研究的许多领域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李仕春依托于语料库技术，将框架语义学理论、生成词库理论等先进理论应用于现代汉语多义词的词义衍生研究，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探索和完善研究常用词义项分布情况，逐渐建立了成熟、规范的学术范式，先后发表了《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黄”字义项分布研究》（李仕春，2016b）《类型学视野下的现代汉语动物多义词义项分布研究》（李仕春、艾红娟，2017b）《框架语义学视阈下的词义衍生研究——以多义词“看”为例》（李仕春，2020）等一系列学术论文，探索用论元结构理论解决动词性义项的划分和描写问题、用物性结构理论解决名词性义项的划分和描写问题、用论元结构理论和物性结构理论共同解决形容词性义项的划分和描写问题。

五、 研究展望

按照词性，现代汉语常用词大致分为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介词等。由于不同词类均具有各自的特点，因此在进行词义衍生和义项分布的研究时需要综合考虑它们各自的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形式，才能够真正全面地揭示词义生成机制。目前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动词、名词和形容词的个案分析和系统研究，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在对于副词、介词、连词等词类的研究方面，学界尚且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我们可以期待，在学者的孜孜不息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在不久的将来，此领域的研究定会取得较大的突破。在此基础之上，也终将形成一套先进的、科学的、客观的、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理论体系，能够根据词类的不同解决大部分现代汉语常用词的词义衍生和义项分布问题，进而成为指导汉语辞书释义的最优理论。

六、 总结

纵观汉语词义衍生研究的整体过程，无论是语文学时期注重考释生僻字词、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注重研究单个常用词的语义演变、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注重研究一类词的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还是生成语言学时期在认知语义学影响下的词义研究，都还停留在传统词义引申层面，也即都是从词义内部的角度研究词义衍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语言研究的理想状态就是在描写清楚语言现象的基础上解释清楚。依靠有限资料建立起来的单维度词义引申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对多义词义项的成因进行全面解释（李仕春，2020）。框架语义学理论、生成词库理论等先进理论为解释词义



衍生关系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式。语料库技术可以使语言研究者高效获得足量的言语样本，为词义研究提供了的定量分析手段。将二者结合起来探讨词义衍生，可以从最大程度上增强语言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我们认为，通过以上学术范式进行现代汉语常用词的义项分布研究，对于归纳现代汉语多义词词义衍生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同时我们也相信，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能够兼顾不同词类的内部语义特征和外部句法表现、为它们的词义衍生研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理论依据，进而能够指导汉语辞书释义的理论体系，也必将实现中国语言学研究自主创新道路上的巨大跨越。

参考文献

- 陈鸿瑶. 副词“也”主观性的认知解释.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2): 95-98.
- 符淮青. 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葛本仪. 现代汉语词汇学.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 郭璞注. 尔雅.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贾彦德. 语义学导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 贾彦德. 汉语语义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蒋绍愚. 关于古汉语词义的一些问题. [A], 语言学论丛(第七辑).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28-48.
- 蒋绍愚. 词义的发展和变化. [J]. 语文研究, 1985(02): 7-12.
- 蒋绍愚. 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 [J]. 中国语文, 1989(01): 45-51.
- 蒋绍愚. 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 [J]. 中国语文, 1999(05): 323-330.
- 蒋绍愚. 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4): 84-105.
- 蒋绍愚. 打击义动词的词义分析. [J]. 中国语文, 2007(05): 387-401+479.
- 黎良军. 汉语词汇语义学论论稿.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李强. 生成词库理论研究述评. [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6, 39(03): 43-54.
- 李仕春. 汉英中型语文词典义项精细度对比研究. [J]. 长江学术, 2016a(03): 122-128.
- 李仕春. 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黄”字义项分布研究. [J]. 2016b(05): 103-109.
- 李仕春. 论世界语言学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J]. 东岳论丛, 2017a, 38(08): 163-168.
- 李仕春、艾红娟. 类型学视野下的现代汉语动物多义词义项分布研究. [J]. 2017b(06): 99-104.
- 李仕春. 框架语义学视阈下的词义衍生研究——以多义词“看”为例.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1): 20-25.
- 刘开瑛. 汉语框架语义网构建及其应用技术研究. [J]. 中文信息学报, 2011, 25(06): 46-52+62.
- 刘叔新. 论同义词词典的编纂原则. [J]. 辞书研究, 1982(01): 55-65.
- 陆宗达、王宁. 古汉语词义研究——关于古代书面汉语词义引申的规律. [J]. 辞书研究, 1981(02): 31-42.
- 齐佩瑢. 训诂学概论.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钱宗武、李仕春. 论中国语言学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17(01): 116-122.
- 苏宝荣. 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 宋作艳. 生成词库理论与汉语事件强迫现象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王力. 汉语史稿. [M]. 北京:中华书局, 2018.
- 吴福祥. 汉语语义演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J]. 古汉语研究, 2015 (04): 2-195.
- 解海江、张志毅. 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兼论汉语词汇史研究方法论的转折. [J]. 古汉语研究, 1993 (04): 85-93.
- 杨雪、宋闻兵.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综述. [J]. 现代语文, 2018 (08): 68-72.
- 袁毓林. 论元角色的层级关系和语义特征.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2(03): 10-22+2.
- 袁毓林. 语义角色的精细等级及其在信息处理中的应用. [J]. 中文信息学报, 2007(04): 10-20.
- 袁毓林. 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 [J]. 当代语言学, 2014, 16(01): 31-48+125.
- 张联荣. 古汉语词义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张志毅、张庆云. 词汇语义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 张志毅、李智初、张庆云. 理论词典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 章宜华. 基于论元结构构式的多维释义探讨. [J]. 现代外语, 2015, 38(05): 624-635+729-730.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SHI LEI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Doctoral Candidat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Huachiew Chalern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Lexicology, Lexicography
	Address (地址):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nprakiet University, 18/18 Debaratana Road, Bangplee District, Samutprakarn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LI SHICHU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Southwest University, P.R.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 History of Linguistics - Lexicology - Lexicography
	Address (地址) : Southwest University, 2# Tiansheng Road, Beibei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China